



東華三院的管理架構非常獨特，由名流商紳親力親為投入，令慈善工作更見成效，值得全球慈善團體借鏡。東華前主席李三元博士正正將這種華人精英行善精神演繹得淋漓盡致——他善用自己作為商人那勇闖新天地開拓商機的天賦，發揮在慈善機構的規劃發展，且在保存東華歷史文物上擔當舉足輕重的角色。卸任後他重返校園在中文大學歷史系苦讀成為哲學博士，涉足其時尚未被研究的廣華醫院史料，如今已先後撰寫及主編三部關於東華與香港二十世紀初至戰時的醫療史書籍。他說東華所珍藏的文獻是瑰寶，不單看到香港民生百年變遷，還看到總理與港英政府的談判藝術；紀錄東華人文精神之餘，還承載了香港中西醫發展的歷史。

歷史充滿偶然，人生亦復如是。最初李博士代表東華委托中大歷史系整理《東華三院歷史檔案資料彙編》系列時，也沒料到自己後來會醉心文獻研究。冥冥中的安排總是這樣玄妙，廣華醫院適逢他在任主席時發現超過 150 冊有逾百年歷史的入院登記冊，載有近 27 萬病人資料，「這些是當年委托中大處理文獻時也未找到的，當時也不知道有這些文物。可能因為我對歷史特別感興趣，找到時我就覺得這些一定要好好保存」。他不等董事會審議，率先自掏荷包出資幾十萬港元將這批史料從垃圾邊緣拯救回來，而東華三院檔案及歷史文化辦公室也因此由他一手創立。

東華文獻透視：

歷任總理力保中華國粹 20 世紀初中西醫療效不相伯仲

「這些文件已經又脆又乾了，它很大本，角落位全部已經脆化，隨時翻頁時已會跌出來，有些曾經濕水又會黏在一起。」李博士坦言，修復這批自 1917 年至 40 年代的入院紀錄時遭遇很多困難。先是香港相關專家不足，要從英國聘請專家來港協助，而所用的紙張香港已絕迹，要特地從日本訂購，「看他們維修真是有很多功夫」。然而裏面的內容蘊藏大量史料，李博

士說起時如數家珍：「有一欄讓你選擇看西醫還是中醫，東華好開放，任由病人自行選擇。登記上會看到住址、人口、性別，香港地區的人口變化全部都看得到，甚麼病最多？分娩的情況如何？看到有些數字的高低變化就要研究當年發生了甚麼事，查究為何有上落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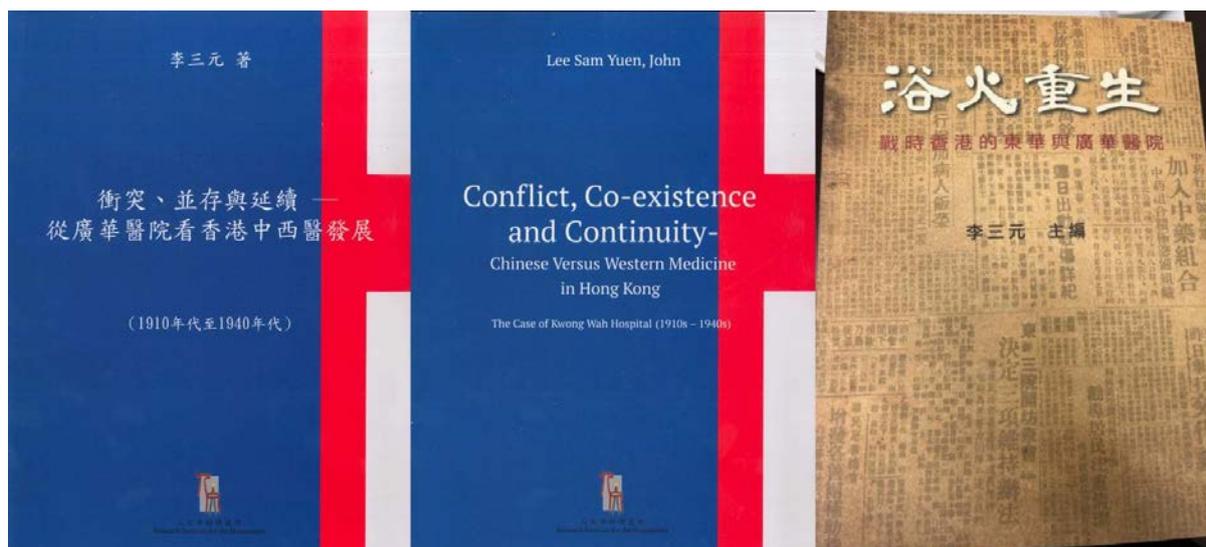
誠如李博士在 2019 年以中英文出版的博士論文《衝突、並存與延續－從廣華醫院看香港中西醫發展》所言，此前雖有不少文獻研究香港醫療史，但「這些文獻未曾評述過在 20 世紀初期，對於香港在該段期間出現的各類常見病症，中醫療效是否確實不如西藥」，他的研究正正填補這方面的缺失。他不單細讀登記冊，還要綜合那段時期東華逾 90 冊會議紀錄、逾 262 冊董事局與華民政務司及外界人士的來往信函等，再在東華檔案及政府檔案史料尋找引證。但研讀史料樂趣無窮，畢竟那不是冷冰冰的數據，而是活生生的故事，細味其中，還看到 20 世紀初中西醫角力下總理們的熱血情懷。



「東華的總理一直守住中醫，你看文獻會看到有些好感動的說話。例如會說，『一日中國仍在，東華一定要行中醫的，一定不可以放棄中醫』。你看得出當時的總理是很愛國的，雖然表面看來他們與英國人很合作。」李博士娓娓道來研究的種種發現，例如當年政府派監院監視醫院運作，企圖逼使醫院取消中醫，但當時商紳也沒有輕易就範，他們與政府的角力也展現當年政商之間的妥協藝術，「當中會看到他們投訴西醫如何干涉他們工作，中間很多拗掙的。還會看到甚麼呢？就是看到雙方都是採取軟姿態的，例如投訴西醫干涉太多，華民政務司就回覆說，『不是這樣的，可能有些誤會，I look into it（我再看看）』。」



經過四年多的研究，那段時間港人醫療狀況、社會及居住環境、東華歷經的困難都逐漸呈現，當中最不容忽視的是，李博士還用嚴謹的史料和數據說明「西方醫學在 20 世紀初並不如現今發達」，他在論文結論闡釋：「結果顯示，西醫並非遠勝過中醫，亦非遠比中醫有效。就所研究的十大最常見病徵而言，中西醫治療的平均死亡率非常接近…西醫只在治療婦產科疾病及身體損傷方面較中醫更為有效…有關資料證明中醫療效與西醫不相伯仲，對某些病徵而言甚至勝過西醫」。



李博士的三部著作：《衝突、並存與延續—從廣華醫院看香港中西醫發展》中英文版；《浴火重生—戰時香港的東華與廣華醫院》

此發現對了解 20 世紀初香港的中西醫角力，以及中醫醫院西醫化的過程尤為重要，因為在那時代背景下，許多受過西方教育的中國人受「現代化思維」影響，本身也以為醫療服務西方合乎科學根據。而李博士的研究，正正為東華總理當年在艱難境況下極力保存中醫傳統的信念，提供強而有力的理性支撐。他取得博士名銜後仍未言休，繼續研究戰時東華與廣華醫院的文獻，相關研究剛在今年出版的《浴火重生—戰時香港的東華與廣華醫院》發表。

借鏡東華制度： 以營商智慧行善 外界捐款絕不扣除行政費

訪問當天張瑞威教授也在席，他特別提到東華管理架構之獨特。他說由商界精英參與慈善事業的做法即使是現在亦值得全球慈善團體效法，畢竟總理們本身有生意收入，用不着在慈善事業謀生計，也決不支取酬金，行有餘力一心行善，善款管理會比其他機構更完善、行政更有效率。李博士身在其中特別有體會。他早在 10 多年前在任主席時就率先提出，這機制必須向外界強調，因此東華從當年起至今，募捐時仍然強調所得捐款全數撥入慈善事務，絕不扣除行政費。

「我說一定要告訴市民，東華所籌得的善款是不會用作行政開支的，不會扣幾個巴仙給總部開支之類，完全沒有的。在東華做總理就是，大家入董事會就各自要捐錢。董事會所有應酬活動費用都是由董事會付鈔的。我們無論聘請多少人去辦籌款活動，例如說當天活動籌到 1000 萬，那 1000 萬是不會扣除任何費用，不



會扣人工、佈置等任何費用。所以現在每個主席募捐，都會強調所得善款一分一毫都不會用作行政費的。」

別以為當東華主席是虛銜，李博士坦言在任期間工務繁重，「一起床已有十幾個訊息，沒有停下來的時間，全部都是東華的工作，例如要作決定、回總部簽名等等」。但原來這也間接促成他重返校園，目的是避免卸任後會空虛失落。他倒說得很坦白：「在任時會覺得自己很被重視的，周圍都有人找你，但一過了3月31日交接後，4月1日就會突然全部靜下來，沒人再找你了，你說是不是很失落？」他卸任後不久就從修讀歷史系文學碩士課程開始，踏上歷史學家之路。

年近花甲重返校園： 放下商人身份求學 決心排除萬難開拓新領域



本身以東華總理和主席等身份與歷史系合作，攻讀哲學博士時會備受優待嗎？答案是：沒有。除非特別嚴苛算是一種厚待。李博士坦言指導老師何佩然教授非常嚴苛，「沒有優待的，她還說，『我是要特別督促你的，因為若然我不督促你，別人會以為我優待你。』她是這樣說明的」。不是說笑，李博士說到這裏，看來真的猶有餘悸，他憶述：「試過寫好草稿交給老師，她一筆就劃走全版。我看着她劃走的那幾版，心想，『這些我是看了很多書、很多資料才寫出來的，真可惜』」。況且研究院要考核第三語言，對他而言是苦差，「那時讀日文讀到我筋疲力竭，那種壓力真的很大，要日夜死記硬背，那段時期真的苦不堪言」。

李博士本身從事皮革生意，過去幾十年在商界以至慈善界叱吒風雲，年近花甲之時重返校園當學生，還要聽老師指點甚至捱罵，筆者不禁好奇當中心態到底如何調整，他倒答得淡然：「我常常覺得人人平等，每人有每人的角色，我不會覺得做生意做老板，好像人人都聽我話，所以也不覺得重返校園要放下身段。但我一決定讀書就不要再想以前的生活，要在另一個領域重新出發，你就是要嘗試在新領域探索啊！那怎麼可以帶着舊的思想或習慣去新領域闖呢？」

原來這份勇於新領域探索的開拓者精神早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1978年12月中國決定改革開放，李博士翌年就到江門洽談生意，他笑談往事：「那時還未有中港碼頭，去江門船程要三個半小時。抵達後下榻中旅社賓館，半夜會有人進來跟你同房，『三唔識七咁』。吃飯時人人餸菜是一樣的，一盤菜，還有一盤紅燒肉……原來是狗肉。」我們聽得膽顫心驚，他驀然回首，承認「當年又真是很勇敢」，他說直到現在，有時還會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一些周邊小鎮找商機。或者做生意總需要一些開拓新領域的勇氣，而這份勇氣來自決心，他說：「我做人出來做事那麼久，從來沒有放棄過甚麼。只要下定決心做好一件事，無論遇到多大的困難，你都不可以怨。」總結自身經歷，他想跟青年學生分享這智慧：「你經過一個難關，都是一種經驗，碰得多你以後再碰到同樣問題你已經覺得不是問題。中間你要學習，成功機會才大。」

關注青年事務：

《東風破》傳達當年情 冀傳承東華人文精神

目前是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校董的他非常關注青年事務，在任主席期間籌拍、紀念東華成立 140 周年的電影《東風破》，也是希望讓青年人了解和體會東華的人文精神。他憶述：「我做東華總理那段時間常常周圍視察，我常常會留意到青年是被忽略。《東風破》就是說東華如何承傳。拍的時候我們任由編導作主，但我們強調你不能硬銷東華，因為越硬銷就越『肉酸』，所以整齣戲從沒有說過東華兩個字，只會見到義莊的牌匾，還有就是主角護士畢業證書上面寫由東華頒發。那齣戲其實也是非直接地希望接觸年輕人。」



李博士提及《東風破》兩幕寫有「東華」的場景，其中證書一幕實在非常低調。（電影截圖）

《東風破》果然不負眾望，不單成為當年亞洲電影節閉幕電影，更囊括多項電影獎項，難怪

李博士捐助東華三院檔案及歷史文化基金並命名辦公室及數碼工作室時，均沒用自己的名字，而是用「東風破」來命名。想當初電影以《東風破》命名，就是比喻在原有基礎上創新，達致新舊兼容，並以浪漫感人的故事帶出東華上世紀為社會提供的原籍安葬、贈醫施藥、義學等服務，讓新一代體會當年情——東華最核心的人道主義和關愛精神。這大概就是保存史料文物、讓歷史一代又一代傳承的真義，也是李博士的熱誠所在。

